

充满生机的土地

——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的调查与思考

刘德福
张家盟 主编
史久武

浙江人民出版社

充满生机的土地

——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的调查与思考

刘德福
张家盟 主编
史久武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充满生机的土地：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的调查与思考/刘德福,张家盟,史久武主编.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2

ISBN 7-213-02146-X

I. 充… II. ①刘… ②张… ③史… III. 非公有制经济-调查报告-浙江省 IV. F1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4510 号

充满生机的土地

——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的调查与思考

刘德福 张家盟 史久武 主编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特约编辑 冯国祥
责任编辑 杨淑英
封面设计 王义钢
责任校对 朱晓阳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杭州电厂路谢村)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2.2 万
印 数 1-9000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146-X/F·358
定 价 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

2000年7月,正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学府学习的中青年干部一年制培训班12位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司局长和地方的市委书记、市长们,到以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著称的浙江省进行调研。他们一路看,一路议,写出了11篇调查报告。其中两篇是由分属两个调查组的同志集体研究、讨论过的,9篇则纯属个人思考的结果。他们的认识有浅有深,看法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浙江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创造性探索的钦佩之情,对在世界历史性大转折、中国历史性大变革的条件下紧跟世界发展进步步伐,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迫切之情。它表明:我们党和政府的官员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是相通的,前进的步调是一致的,仅此一点,就预示了我们伟大祖国光辉灿烂的前景。

参加调研活动的有12位同志,分为两个组。

非公有制经济考察组

组长 张家盟 中共浙江省舟山市委副书记、市长

成员 褚平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朱明德 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副书记、政协

主席

刘春良 中共河南省许昌市委副书记、市长

毕井泉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价格司司长

秦小明 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正局级)

刘德福 中共中央金融工委研究室主任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调研组

组长 史久武 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市委书记

成员 李荣芝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局级调研员

蒋建国 中共湖南省邵阳市委书记

郭树人 中共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副书记

徐松南 中共湖北省荆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收入本书的 11 篇调研报告,都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在报刊上发表时,因版面所限,大都作了删节。现在我们按原稿排印,这样,更能反映作者的原始观点。当然,也会显得粗疏一些,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为了帮助大家从理论上深入认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特将刘德福在 198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附后,供读者参考。

编者

2000 年 9 月 25 日

目录

1	写在前面
1	充满生机的土地 ——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调查报告
15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
23	实现繁荣富强的重要途径
32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39	一部思想解放的史诗
48	新领域 新途径 新方法 ——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专项调查
75	党组织在私营企业中的地位作用问题
94	非公有制企业党的组织的组建模式
102	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中亟待研究的几个问题
124	一个亟待探索的新领域
134	共产党员要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发挥模范作用
142	附录 论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

充满生机的土地

——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调查报告

骄阳七月，我们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赴浙江考察一行7人，驱车在千里浙江大地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簇簇新建的楼房，一座座新兴的城镇。到处是热气腾腾的繁荣景象，到处是热情高涨的劳动人群。浙江省负责同志告诉我们，浙江经济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活力，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次之所以不断前移，非公有制经济功不可没。去年，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工业产值已达到5500亿元，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5.6%，一些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县市，已超过“半壁江山”甚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个体私营占了59.7%；非国有经济提供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73%以上。这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展现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冲破思想的束缚

生机和活力源于思想的解放。浙江省负责同志说：“我

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广大人民群众冲破‘左’的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的一部创业史。”这真实地反映了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艰难历程。

从怕富到致富。千百年来受屈辱被奴役的中国人民与穷为伍，与富无缘。在毛泽东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人的中国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建设美好新生活的权利。然而，数千年的传统习惯，长期“左”的思维定势，却使人们不知从何时起，竟然把“穷”和马克思主义道理扯在一起，富则和修正主义划上了等号。人们畏富、惧富、怕富、避富，穷光荣，富则修，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温州自南宋以来便是商贾集聚的地方，1876年即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与东南亚国家一直保持着经济贸易关系。温州人素有从事小商品生产和设摊开店的习惯，并以此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但是，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温州700万人口却只能在人均只有0.4亩的耕地上搞饭吃，“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贷款”，搞成这样了，还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捍卫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第一项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亮出来后，“春江水暖鸭先知”，温州人明确地意识到，他们的苦日子到头了，吃饱穿暖的日子来到了。他们率先发展起家庭工业，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这样，不仅把每个家庭、每个亲戚朋友、每个人的体力和精力充分调动起来了，而且把每个人的智慧都充分发掘出来了。正是家家户户从事企业经营，使每个家庭都直接面对市场，都直接承

受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大家都想办法，解决生产、经营和销售中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为了能把产品推销出去，温州人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正是靠了这种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极大的致富的积极性，短短数年，就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使相当多的人由穷变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先富带后富，使浙江人民看到了共同富裕的希望。

从小富到大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家庭工业的发展，人们的锅里有了鸡鸭鱼虾，身上有了名牌时装，家里有了漂亮楼房，口袋里的钱越攒越多。消费剩余的钱能不能用来购置大型生产资料？企业能否超出家庭成员的范围而吸纳社会闲置劳动力？从家庭小作坊发展到招收数十名、几百名甚至上千人的大企业，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倒退？这是在干社会主义，还是在干资本主义？精明的浙江人在没有搞清这些复杂问题前就在实践中干起来了。在温州、台州、金华、舟山等地区，不止一个如今拥有亿元资产的非公有制企业家向我们反复讲述着这样一些简单而朴实的道理：我的企业资产是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我上缴的税收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我解决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贫困地区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谋的是人民的利益，这不叫干社会主义，难道像我过去吃饭靠救济、挣了一点钱吃光花光就是干社会主义，就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而像我现在每天呕心沥血工作18个小时，拼命为社会创造、积累财富就是干资本主义，就成了人民的异己分子？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许许多多

个体、私营企业家正是凭着这样一种信念，抑制个人消费，千方百计把每一分钱变成资本，扩大企业规模，逐步从小富变中富变大富。我们接触到的每一个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家，都不是踏歌而行发展起来的，都有一部催人泪下的“发家史”。在台州，我们见到了飞跃缝纫机集团公司总裁邱继宝。改革开放前，他曾因用自行车载货搭客挣钱被当作惟利是图的典型批判。80年代末，他带着自己的产品去参加广交会，由于私营企业的“身份”不得入内，只得从下水道钻入会场，结果被发现后遭罚站、罚款，受尽屈辱。但他坚忍不拔，愈挫愈奋，终于使他的企业从小到大，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缝纫机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跻身于世界缝纫机制造业先进行列，不但不会再因“出身”被排斥于交易会之外，而且建成了覆盖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完整销售网络。

从民富到国富。私有经济多了，会不会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会不会威胁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浙江人通过实践认识到：应当辩证地看待“公”与“私”。舟山的同志拿着手中的货币给我们举例说：货币无非有这样几种用途：一是用来消费，在你这方是个人消费，在另一方是社会生产；二是用来储蓄，在你这方是个人储蓄，存到国有银行就是国家可以调用的资产；三是用来购买股票、债券，这是直接的公共投资行为；四是用来捐献，这更是变个人财产为社会财产。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则作如是说：马克思在对资本的论述中有这样一句话，资本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只要在社会再生产中不停地运转，它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就绝对不是什么公有和私有的问题，它就是为社会发挥效益。正泰正如

马克思所论述的那样不再仅仅是南氏兄弟，或是董事会股东们的正泰了。它属于整个中国的低压电器，属于整个民族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人创造的财富越多，公用的比例就越大。正是具有这种清晰的认识，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让老百姓富了才是最大的政绩”作为信念，不是想方设法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是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是防止、压制人们从小富变大富，而是支持、引导人们富而思进，把家业越搞越大，从而促使非公有制企业蓬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浙江省总体经济实力，而且给国有企业带来了真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强大的社会需求，促进了改革发展的步伐。1978年以来，浙江省在国家投资不多的情况下，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保持了年均20.3%的速度增长，其资产总额比1978年增长27倍多，在关系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仍占主导地位。这几年，在浙江全省重新安置就业的数十万下岗职工中，非公有制企业安置的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非公有制经济发达的地市，城镇居民几乎没有下岗的观念，人们已把失业问题看作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台州市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彻底改变城镇居民就业单纯依靠国有单位的状况，1999年底该市市区登记失业率仅为3.2%。以小商品城闻名的义乌，下岗职工仅有4名。这些人也不是没有就业的岗位，而是条件要求太高。这对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放开被捆绑的手脚

在浙江考察时，我们每到一地，都要询问当地的领导者，经济发展快的秘诀是什么？一个共同的回答就是：由于解开了群众被捆绑的手脚，积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调动了千军万马、千家万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释放了群众发展经济的潜能。市场经济，说到底是群众经济。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老百姓的手脚被捆绑得死死的。房前屋后种瓜种豆是资本主义，长途贩运赚点辛苦钱，被叫做投机倒把。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当时的法律、政策和管理都有严格的规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步一步地更新观念，一步一步地放开群众被捆绑的手脚。

政策上的鼓励、引导。努力消除对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歧视和限制，积极创造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20多年来，针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偏见，从省委、省政府到市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在争论中逐渐形成共识，不搞“成分论”，因地制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尤其是一些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从当地实际出发，在经营范围、组织形式、企业名称等方面，减少了不必要的限制，在注册登记、税收、贷款、用地等方面，尽可能做到与公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党的十五大以后，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像抓国有、集体经济那样，放心、放手、放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省委、省政府专门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个体

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通知》，舟山、宁波等各地市也都制定了贯彻这一文件的具体措施。舟山从市、县(区)到乡镇、村，层层召开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动员大会，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重点来抓。他们提出，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坚持“四个长期不变”：坚持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长期不变；坚持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政策长期不变，坚持保护个体私营经济权益的政策长期不变；坚持对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和引导的方针长期不变。对个体私营经济做到“四个不限”：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实行“六个平等”，即企业登记平等、税收管理平等、规费标准平等、金融贷款平等、市场准入平等和部门服务平等，使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三个有”：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引导各种所有制经济步入公正有序、平等竞争的环境。

法律上的鼓励、引导。改革开放前，我们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是围绕维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每一步几乎都要和传统的政治法律观念相冲突。80年代初乐清县柳市镇五金电器市场8位靠劳动致富的私营企业主，就曾被扣上“八大王”的帽子，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受到严厉打击，或被关押，或潜逃在外。他们被打击的原因就在于不合“法”。如“电机大王”胡全林，1981年营业额达到120万元，工作组一到，光税就补缴了6万元。因他雇了9个人而被批判为“雇工剥削”，于是收起摊子躲起来，1982年9月被全国通缉。直到1984年打

听到当地改变了政策才回家，想不到公安局还没结案，把他逮捕归案关押了66天。温州市委在学习中央有关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文件后召开全市电话会议，郑重宣布为“八大王”案件平反，所有人员无罪释放，恢复名誉，全部归还被没收的财产。个体私营企业初创时，无人认可，牌子不香，便创造出挂户经营，挂到集体、全民单位，找顶红帽子戴，结果对一批“贪污”了自己财产的人判了刑，判了又纠。这种颠三倒四、反反复复的判案给法律出了难题，要求法律法规拿出个固定的说法。温州市政府率先出台了鼓励和引导私营经济发展的《私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该规定后来成为国家《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蓝本。股份合作企业也有类似遭遇，它“非驴非马”，既不像集体又不像私营，当全国的法律还无视它的存在的时候，当执法部门还拘泥于或公有制或私有制的标准划分经济企业性质时，温州市政府就于1987年11月颁发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于产权问题，温州市政府还专门制定了《温州市推进企业兼并实现企业产权转让的暂行规定》、《温州市企业产权转让程序和温州市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事务所章程》。1998年3月，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宪法大法的形式，最终确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包括浙江省干部群众在内的创造性实践的科学总结和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肯定。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还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清理，严禁任何部门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对没有法

律根据的,未经权限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对超过收费标准的予以纠正。他们把减轻个体私营企业的负担与减轻国有集体企业负担一样,纳入了各级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范围,努力为个体私营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去年,舟山市取消了40项收费项目,降低了36项收费标准,同时调减了电、水、气价格,停收了进岛车辆通行费等,年让利额达1亿多元。

管理上的鼓励、引导。各级党委和政府本着“对不该管的事情坚决不管,对该管的事情要认真管好”的思路,积极探索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处的位置,不断矫正自身的“坐标”,努力正确地发挥自身作用,以保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突出表现在许多地方在培育和发展市场方面所采取的“先放后导”、“先予后取”、“先市后城”的方针上。所谓“先放后导”,就是首先放开市场,让干部群众放开手脚,大胆地去试验、创新。在此基础上后导,针对在放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甚至存在的诸多的不良行为,加以引导、规范和惩治。所谓“先予后取”,就是先支持帮助个体私营者发展起来,然后让他们照章纳税,回报社会。大多数群众创业的起始条件非常艰苦,让渡一定的利益给予扶持是十分必要的,有人形象地把这叫做要养鸡生蛋,不能杀鸡取蛋。所谓“先市后城”,就是先培育市场,积累资金,然后进行城市建设,搞好基础设施,推进经济上新台阶。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还十分强调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十分注意校正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有的政府部门为了局部利益、小团体利益,巧立名目,层层设卡,重

复收费,甚至打着依法管理的幌子吃拿卡要,把管理变成收费,把服务变成要钱。对此,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整治措施,依据党纪国法予以严惩。舟山市成立了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今年,该市将对各类审批事项取消 1/3,审批核准等事项合计取消 1/3。市委、市政府还规定,除法律法规和上级规定者外,停止对个体私营企业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活动。这些都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在保护、支持、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注重对个体私营经济者的教育和管理,教育他们爱国、敬业、守法,引导他们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走私贩私、搞假冒骗、偷税漏税、制黄贩黄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有效地规范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经营行为。

睁开眼睛看世界

我们在浙江省考察时,最为欣喜的是了解到,在行走于全球的企业家队伍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浙江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家的身影。近代工业文明的出现,是以生产的社会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为标志的。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民营企业队伍的形成,说明我们古老的华夏民族正在实现着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巨大的历史性跨越。

浙江经济是以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而著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和优势是依靠个人的勤劳智慧、明晰化的产权制度、低度化的启动资本与市场经济扩张。在我国市场

发育不是很高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却干得很漂亮，但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难能可贵的是，浙江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家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帮助下，不断超越自我，向生产社会化、企业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实现由传统家族管理向现代科学管理的转变。非公有制经济多数是从家族企业发展起来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往往集于一身。这种家族型的企业管理模式，在创业初期确有很高的增长势头，但是，企业有了一定规模后，这种家族式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了。浙江不少业绩不凡的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发展的经验，突破狭隘的家族意识，自觉改变纯粹家族式的管理，启用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手段进行规范化管理。近几年，在杭州、绍兴、温州、台州、金华、宁波、舟山等市，企业组织制度的变化有“两个趋势”，“三大变革”。“两个趋势”，一是集团化的趋势，出现了万向集团、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天正集团等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二是大量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轨的趋势。“三大变革”，一是产权制度变革。企业产权由一元化、封闭化向多元化、开放化变革，产权的大门不仅向有钱的人开放，而且向有知识、有技术、有管理决策能力的人开放。二是董事会制度变革。主要是由董事会、经理班子合二而一改变为董事和经理相对分离，外部专家董事与内部执行董事互补结合。如中国天正集团1998年进行了重大的改制创新，董事会与经理班子在职能上彻底分开，董事会负责拟订公司发展的目标、重大的发展决策、经理班子的考核等等。公司还聘请了4名专家董事，形